

柏克的保守主义革命虚无论批判

梁 孝

【内容提要】以柏克为代表的英美保守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应该通过渐进的方式进行，但激进知识分子由于理性的傲慢，以乌托邦蛊惑群氓，制造革命，推翻既定制度，消灭贵族，付出了本可以避免的巨大的社会代价。这种革命虚无论在我国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根据唯物史观，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内在矛盾的不断积累和社会危机的深化，而不是以理性构建乌托邦的主观冲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日常经验辨别真假是非。真正的革命依赖于人民群众的觉醒，而不是操纵人民群众的意识。贵族不能创造和主宰历史，人民民主是历史发展的潮流，贵族的消亡是历史必然。

【关键词】保守主义 革命虚无论 理性 群氓 贵族

作者简介：梁孝（197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英美保守主义以学术思想的形式进入我国，先在思想界传播，进而影响到社会观念。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这些英美保守主义思想以简化、碎片化的形式广为传播，似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常识”。这些流行的所谓“常识”，否定革命，否定中国革命史，侵蚀着主流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 and 批判。英国思想家埃德蒙·柏克（以下简称柏克）被认为是现代英美保守主义的创始人。本文从唯物史观出发，通过分析柏克的核心论点，对保守主义革命虚无论进行梳理、辨析和批判。

一、柏克的保守主义革命虚无论主要观点及其在我国的影响

埃德蒙·柏克（1729—1797年）是英国辉格党人，保守主义思想家。在柏克生活的年代，英国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化，辉格党代表其阶级利益。作为辉格党的代言人，柏克既反对绝对王权，又反对“平民”的“暴政”，要求在维护宪法规定的自由秩序的前提下解决社会问题。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一些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英国思想家欢欣鼓舞，但柏克对法国大革命持极端敌视态度。1790年底，他出版书信体著作《法国革命论》，阐述了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可以概述如下：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传统和成见在社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变革应该通过渐进的方式进行，但激进知识分子由于理性的傲慢，以乌托邦蛊惑群氓，制造革命，推翻既定制度，消灭贵族，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现代英美保守主义由柏克的思想发展而来，重习惯、重传统、

重现等级秩序、重自由，主张以渐进方式变革社会。英美保守主义将柏克视为“思想教父”，将《法国革命论》奉为经典。

就革命观而言，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有三个核心概念：理性的傲慢、群氓和贵族。他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否定。

首先，柏克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革命是理性傲慢的产物。作为一位生活在18世纪的基督教徒，他强烈反对启蒙运动中的理性观念。他认为，上帝是存在的，人、社会、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体现着上帝的善良目的和智慧；世俗秩序源于上帝赋予的神圣秩序，古老的习俗、道德、成见也都体现着上帝的目的和智慧，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节制人性中的恶；现存世界在空间上广大无边，在时间上联系古今，人们所认识的秩序只是无比宏大的秩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秩序中所蕴含的上帝的智慧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经验积累而体现出来的，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无法完全认识这种智慧，人要在上帝的智慧面前保持谦卑。因此，解决社会中的问题，要根据传统和成见，根据具体条件便宜行事，循序渐进。柏克认为，法国启蒙思想家想用抽象的理性建构理想社会，并在社会中实现这一理想社会，但最终结果必然是毁坏现存秩序，释放出人性中的恶，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理性傲慢的产物。用现在的概念来说，柏克认为，社会制度是历史的、内生的、有机的，不可能完全靠理性来构建、由外部力量强加给社会。

其次，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启蒙知识分子煽动、蛊惑的产物。在柏克看来，启蒙知识分子是一小撮阴谋家、蛊惑者，他们通过控制舆论影响和利用第三等级，尤其是利用穷人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和计划。他认为，对这些启蒙知识分子而言，“这些变革无论是通过专制主义的雷霆，还是通过群众骚乱的震荡来实现，全都无关紧要”。“这些作家们，像所有鼓吹新鲜事物的人一样，装出对穷人和卑贱者的极大热情，同时他们用种种讽刺极力夸大宫廷、贵族和教士的错误，使之令人憎恶。他们变成了一批蛊惑者。”^①

再次，柏克认为，革命中的群众是极易被蛊惑的群氓。假如革命源于理性的傲慢和一小撮阴谋家的蛊惑，那么，革命中的群众就是一群极易被操纵的、非理性的群氓。在柏克看来，法国三级会议中的第三等级，绝大多数是“下等的、无知无识的、机器般的、纯属各行各业的驯服工具的那些成员们”^②，是一些极易被欺骗和蛊惑的人。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指出：“伯克（同柏克，只是译者用字不同——作者注）隐含的意思是，人民大众很少运用较高层次的理性，而且从来也不会这样做：没有了民间智慧（folk-wisdom）和民俗规则（folk-law）——这两者就是成见和习俗，他们也只能为煽动家们鼓掌助威，给江湖骗子奉上钱财，并顺服于独裁者。”^③

最后，柏克认为，贵族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打倒贵族会造成社会灾难。法国大革命打击教士和贵族的特权，扫荡贵族，而柏克则极力为法国贵族辩护。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只是在上帝面前道德上的平等；人们的天赋不同，社会地位就会不同；社会的等级结构、不平等是天然合理的；这个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习俗、成见、道德秩序都体现着上帝的目的，制约着人性的恶；贵族是这个秩序的体现者和维护者，是上帝和大众之间的中介。他认为，贵族是“由有恒产的、受过教育的人和有着诸如扩展与解放理解力这样的习惯的人们所组成的”，“是社会秩序中一件优美的装饰品。它就是一个优雅社会的科林多式建筑的雕花柱顶”^④。在柏克看来，贵族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如果没有

① [英] 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48、149页。

② [英] 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55页。

③ [美] 拉塞尔·柯克：《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张大军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40页。

④ [英] 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54、182页。

贵族维系着道德和习俗，社会就会失去秩序，人性的恶就会释放出来，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总而言之，柏克认为，革命源自人的理性的傲慢，是人为的产物，是一场社会灾难，而走一条渐进的变革之路就可以避免这一灾难。

英美保守主义者认为，柏克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振聋发聩”的批判，使英国渐进式的政治传统得以加强。“英国社会变得保守起来，而伯克本人则是这一态势的首要推动者。”^①后来的一些保守主义者（也包括一些自由主义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深化了柏克关于理性有限的观点，并将其作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他们认为，在抽象的、系统的理论知识之外，还有一种个人知识，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模糊的、实践的、个人化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社会运行所不能缺少的；社会主义所提出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仅看到理论知识，没看到个人知识。哈耶克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以建立在个人知识上的市场秩序来反对计划经济，将社会主义称为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将启蒙时期研究社会规律并希望以此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称为“理性滥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思想界受到英美保守主义的影响。一些学者奉柏克、哈耶克的思想为圭臬，以英美保守主义思想“反思”中国近现代史，进而否定中国革命。他们认为，近代以来，始于欧洲的大变革分为两种政治传统：一种是英美式渐进改良的政治传统，它坚持经验主义的渐进理性，看似缓慢，但代价小，社会民主、富裕、繁荣；另一种是欧洲大陆传统，它依据理性主义的建构理性，认为凭借理性能够建构一个理想社会，主张进行激进的革命，彻底颠覆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其结果不仅社会代价巨大，而且后患无穷。他们认为，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中国以英美为师，渐进改良，先器艺，后改制，再文化，成绩斐然，但由于激进政治传统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激进化，导致中国发生革命，打断了中国渐进改良的道路，付出了本可以避免的巨大的社会代价。换言之，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激进知识分子鼓动乌合之众的产物。另外，在网络自媒体中有这样一种影响颇广的观点，即革命消灭了贵族，导致群氓横行，社会问题丛生。这些思想观念在我国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淆，需要予以认真的分析和批判。

二、革命的根源在于社会基本矛盾而不是“理性的傲慢”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革命早已作出科学论述。在社会结构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一定的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时，就会促进生产力发展，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时，就会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生产关系就会阻碍生产力，上层建筑就会阻碍经济基础。生产力是社会结构中最革命的因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本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会逐渐走向不适应，社会结构中的矛盾会不断积累。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②

不管是激烈的革命还是渐进的改革，都是解决社会结构中的矛盾的社会行动。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从根本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导致巨大的社会危机的时候，就需要彻底打破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此时革命就成为时代任务。在革命的时代，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

① [英] 拉塞尔·柯克：《保守主义思想——从柏克到艾略特》，张大军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页。

机，革命的阶级要求彻底变革既有制度，而旧统治阶级则力求维持既有制度，由此形成所谓“激进—保守”的对立。在建设的时代，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矛盾，但矛盾保持在一定限度的时候，渐进的改革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在建设的时代，一个社会为了发展生产力而进行的渐进改革，与革命时代旧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进行的“改良”存在根本区别。

从唯物史观来看，以柏克为代表的英美保守主义关于“理性的傲慢”导致了灾难性的革命的观点（以及我国学者相关论述）存在以下错误。

第一，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唯心史观。柏克把革命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的主观思想因素（理性的傲慢），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作为一种从根本上改变既存社会结构（并伴随着激烈社会冲突）的社会行动，革命的最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这种矛盾导致巨大的社会危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但归根结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社会结构中的客观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而激化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反映到人的意识中，形成革命的各种呼声和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设想。这就是所谓的“激进主义”的革命思想观念。它本身就是革命时代的一种产物，在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推动着革命，影响着革命的进程，却不是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更不能成为独立的原因。在革命的时代，普遍存在所谓“激进—保守”的对立，但到底哪种力量取得优势，则是由双方的力量决定的，而不是由所谓“建构理性”和“渐进理性”决定的。

第二，英、法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社会矛盾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两国解决国内问题的不同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沿海地区发展，不断扩展，形成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存在不平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形成了一定的时间差。当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法国资本主义刚刚起步。当法国资产阶级为了阶级利益而进行推翻封建主义的革命时，英国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已经战胜了封建主义，英国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已经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了，因此英国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定社会制度内通过渐进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柏克主张在维护宪法规定的自由秩序的前提下，按照“惯例”去解决社会问题，不过是对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

柏克推崇英国 1688 年的“光荣革命”，反对法国大革命。但是，如果正视历史，就会看到，1688 年革命只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一个阶段。在 1640 年开始的英国革命中，代表小商人和小贵族利益的国会军队和保皇党人的军队之间进行了数年惨烈内战，英国国王被砍头，后来复辟的封建势力将克伦威尔鞭尸。各种阶级力量分化组合，以各种名目争夺阶级利益。柏克对这段历史避而不谈，杜撰出所谓的英国政治的保守主义传统。英国之所以能够保守，是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在生产力发展中，新生的英国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微调来解决、控制社会矛盾。

第三，柏克混淆了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与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的构想。柏克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原因在于，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机械性特征的批判命中要害。法国启蒙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把社会历史还原为个人，又将个人归结为某种人性，由此设定社会起源的“自然状态”，再从人性推论出理想社会，并通过理性的“契约”实现这个社会。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还原论和非历史的特征。它没有看到，社会制度的起源、发展和衰落是个历史过程，每个社会的产生都有其现实根据。柏克关于“理性的傲慢”的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针对启蒙思想对社会、历史的机械性理解而提出的深刻批判。但是，启蒙思想家对理想社会及其实现理论构想是一回事，革命的真实历史进程是另外一回事。柏克混淆了二者，把启蒙思想家的“理性设计”作为革命的原因。

柏克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误，其原因在于，就对革命的认识而言，他与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观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启蒙思想家用理性来解释历史的进程。他们认为历史中各种苦难是因为人的理性被遮蔽，人们愚昧无知，容易被欺骗，因此要用理性之光进行启蒙。启蒙思想家用思想观念来解释历史，用“骗子+傻子”的公式来解释重大历史事件，这是当时典型的唯心史观。在柏克看来，法国大革命是由于启蒙思想家狂热的宣传鼓动而爆发的。他认为：“文学家阴谋集团在几年之前就制订了某种摧毁基督教的正式计划之类的东西。他们狂热地在追逐这个目标，那种狂热程度迄今为止我们还只在某些虔诚体系的布道者身上看到过。”^①这里，柏克也是用“骗子”（启蒙者）+“傻子”（群众）的公式来解释法国大革命。柏克和启蒙思想家都把思想聚焦到理性，只不过启蒙思想家高扬理性，而柏克强调理性的有限性。

第四，柏克的社会历史观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远远超越和扬弃。柏克关于社会内在、有机发展的思想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启蒙主义者关于理性进步的思想、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关于社会有机发展的思想，已经被黑格尔批判吸收后纳入其思想体系。在黑格尔的历史观中，世界历史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合乎规律的人类历史进步的进程，在进步中存在着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社会有机的量变积累必然会产生革命的质变，二者并不截然对立。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历史观进行扬弃，在现实的社会基础上形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完全超越了柏克的社会历史观。

第五，并不存在英美保守主义所说的两种政治传统。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是爆发革命还是渐进改革，最终要看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当社会矛盾积累到无法解决时，革命就会爆发；当社会问题不涉及社会结构的根本矛盾时，人们就会进行渐进改革。在革命时代，英国革命的暴烈并不亚于法国大革命。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②。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帝国主义政策，利用超额垄断利润，收买工人“贵族”，实行一定的让步政策。这样，在爆发了大革命的法国和产生了所谓“建构理性”代表人物的黑格尔又产生了马克思的德国，革命政党中出现了主张渐进改良的修正主义。同时，革命重心不断东移，曾被视为欧洲反动堡垒的俄国出现了革命形势。革命最终是以社会矛盾的发展、阶级力量的变化为基础的，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政治传统。

第六，中国革命是解决时代问题的必然选择。中国有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在明代时，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1840年以后，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西方帝国主义瓦解中国封建经济基础，给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原材料市场和商品市场。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已经不可能走上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之路，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封建主义势力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群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这是时代主题。一些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选择性失明。在他们看来，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西式民主政体，一个现代国家框架稳定渐进，

① [英] 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46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8-579页。

正在成型。但是，只要正视历史就会看到，这些所谓的“成就”实际上都是失败，它们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这些所谓治国体系根本没有国家治理能力，内不能实现国家统一，外不能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更不要说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这个历史进程实际上是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后来的民族资产阶级）想通过有限度的变革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但由于其阶级局限性而不断失败的过程，是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成为解决矛盾的必然选择。

三、革命需要人民群众的觉醒而不是被蛊惑

在革命的时代，统治阶级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阻碍者，而随着新的生产力产生的阶级代表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其自身的阶级利益也代表着各个被统治阶级和阶层的普遍利益。因此，革命是被压迫阶级在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先进阶级的领导下，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过程。先进阶级（及其政党）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靠的不是某种“乌托邦”式的许诺或者情绪化的蛊惑，而是制定反映人民群众真实利益诉求的革命纲领，并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让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利益，理解革命纲领，然后参与革命，通过斗争实现纲领，最终获得解放。这是革命的本质和真实过程。

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把革命视为极端政治小团体蛊惑的产物，把人民群众视为极易被蛊惑操纵的群氓。但是，他们无法解释一个问题，即人民群众为什么偏偏只相信这些少数“激进分子”的言论，而不听统治者的劝告呢？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革命政党的力量最初都是非常弱小的，其宣传的物质条件极其有限，相反，反革命力量的宣传机器则非常庞大。可是，人民群众跟随前者进行革命，却不听从后者的宣传，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并非群氓，并非乌合之众。人民群众有自己的辨别力。人民群众属于社会的特定阶级和阶层，他们有自己的现实利益，有自己的愿望。虽然底层人民群众没有文化，而且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他们有日常的生活经验，有反思能力。他们或许不能用理论解释自己的经验和愿望，但能用自己的日常经验思考那些理论和纲领，能够辨别出哪些理论和纲领符合自己的利益。

英国学者乔治·鲁德根据巴黎警察局的档案记录，对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进行研究，对保守主义的“群氓论”进行了驳斥。他发现，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绝大多数是底层各行业的劳动者，诸如作坊老板、工匠、工资劳动者、店主、小商贩等。在法国大革命中，“虽然参加这些事变的革命群众绝大部分是由无套裤党组成，但他们绝不是来自同样的社会集团。如果把他们说成是巴黎下层社会性质相同的、无名的‘乌合之众’，只要政治领袖一发命令就会立即采取行动，或者由于饥饿或暂时不满的刺激就会自发地产生反应，事实上，那将是一种明显的过分简单化”^①。

在法国大革命中，群众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各种政治势力都千方百计争取群众支持，而群众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选择进步的政治力量。雅各宾派因提出有利于底层的政策而赢得群众支持，但是由于它没能解决粮食问题，尤其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限定工资，因而又失去了底层的支持，最终在1794年热月政变中被敌对力量推翻。1795年，法国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保王派煽动群众反对国民议会，图谋推翻共和政体。“但是无套裤党人

^① [英] 乔治·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何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1-182页。

和工人们非但没有为了向国民大会算账而和各区叛变者联合起来，而且为了共同保卫共和国反而更靠近了国民议会，并斥责各区分裂者为保王派和大腹贾。”^①

为什么而斗争？这是人民群众支持、参加革命的关键问题。真正的革命及其正确的革命纲领，都是从根本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代表着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这样，革命政党才能真正动员起人民群众参加革命，为其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而斗争。列宁指出：“进行战争和继续战争的是哪个阶级，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正因为我们的国内战争是解放了的工人和农民进行的，是劳动人民为摆脱本国和全世界资本家压迫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继续，所以在俄国这样一个受了四年帝国主义战争折磨的落后国家里，人们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在难以想象的无比艰难困苦的两年中把战争坚持下来。”^②

真正的革命（其代表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要有先进阶级的领导、科学理论的指导、革命领袖、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纲领、严密的组织，而所有这些因素要发挥作用，又须以人民群众的觉醒为基础。因为革命是被统治阶级联合起来推翻没落的统治阶级的斗争，只有被压迫阶级真正觉醒，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革命的第一步是教育群众。但是，教育群众必须以群众的真实的愿望、认识和经验为出发点和根据，而不是像保守主义所想象的那样，用“乌托邦”式许诺对无知的群众进行欺骗蛊惑。

俄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明确提出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由于列宁的革命纲领暂时还不能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列宁要求全党深入到工人和士兵中，耐心、细致地进行思想工作，同时一再强调不能欺骗群众。“我们不是江湖骗子。我们只能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即使因此而不得不处于少数地位，也只好如此。可以暂时放弃领导地位，不要害怕处于少数。”“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使群众不再受骗。我们不希望群众相信我们的诺言。我们不是江湖骗子。我们希望群众从实际经验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③

在中国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实施都是以群众的觉醒程度为基础的，而不是所谓的“诱导”“蛊惑”。毛泽东指出：“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群众路线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④。

柏克关于革命的“群氓论”“蛊惑论”，并不像保守主义者所推崇的那么深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也认为，“他所憎恶的大革命变革是由国民议会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和他们对巴黎‘乌合之众’的蛊惑控制而引起的”^⑤。这种观点只不过是统治者对革命和人民的一种傲慢的敌视态度。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居高临下地俯视人民群众。因此，他们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人民群众。在他们眼中，群众不是有着自己的利益和日常生活经验的人，而是抽象的符号，他们任

① [英] 乔治·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何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2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4、10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2、1013页。

⑤ [美] 谭旋：《路易十六出逃记》，赵雯婧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3页。

意把自己的主观好恶加在人民群众头上。

四、创造历史的根本力量是人民而不是贵族

关于革命消灭贵族带来灾难这种观点，涉及历史观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前述观点的实质就是认为贵族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消灭贵族是灾难性的。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只不过把英雄具体化为贵族。

柏克关于贵族的观点，以及我国传媒中流行的一些关于贵族的论述，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贵族。所谓贵族，不过是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来，在国家中居于统治地位，对财产和政治地位世袭垄断的统治阶级。他们控制着经济、政治和文化，同时，他们利用自己所控制的文化，把自己的地位神圣化、神秘化。一般来说，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有统治的职能和管理的职能。作为少数统治阶级，贵族执行着统治职能，即从社会中提取财富供自己享用，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同时，他们也执行着管理职能，维护着社会秩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当人们把目光更多地聚焦于政治和这些统治者时，历史就成了这些贵族们的英雄业绩（或者劣迹）的记录，从而形成英雄史观。历史似乎是由他们创造的，离不开他们。柏克关于贵族的的思想，不过是英雄史观的“贵族”版本。

第二，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而不是贵族。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基本结构中，物质生产是一个社会更深层的、决定性的活动。劳动人民是物质生产的主体，他们创造物质财富，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基础和素材。虽然历史人物的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但是，他们的活动要以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时，当上层建筑制约经济基础时，这种社会矛盾就会集中反映到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诉求中，形成潜在的革命力量。历史人物的作用就在于顺应这种诉求，找到实现这种诉求的现实道路，实现社会的变革。不是英雄创造历史，而是英雄顺应历史潮流，顺应人民的变革的要求。所谓的贵族也是如此。

第三，在社会灾难中，贵族本身往往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认为，打倒贵族会引起社会大灾难。但是，历史往往正相反，社会的大灾难通常是贵族造成的。贵族放纵自己的贪欲，剥削压榨人民，无限制从底层压榨财富，民不聊生。最后或者人民揭竿而起，或者外敌入侵。不是人民打倒贵族导致天下大乱，而是贵族无视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导致天下大乱而被消灭。

英国辉格党代表资本化的大地产贵族的利益。把柏克的贵族观和大地产贵族的利益相联系，就可以看出柏克贵族观的本质和虚伪性。柏克推崇贵族不可动摇的地位，实际上是要掩盖大地产贵族在英国造成社会危机的掠夺行为。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过程，也是资本化的大地产贵族进行圈地运动，掠夺农民，造成农村深重的社会矛盾的过程。柏克了解英国农村的危机，对革命深怀恐惧。也正因为此，他极力反对法国大革命，美化贵族，维护贵族地位。但是，这位动辄大谈保持“传统”“习俗”“成见”的保守主义者，却对英国土地贵族破坏传统的土地制度的圈地运动避而不谈。即使推崇柏克思想的拉塞尔·柯克也无法回避这种明显的矛盾，他指出：“伯克对英国农村社会的衰败不置一词……就在伯克为英国橡树下淡漠的牛群辩护之际，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这是辉格党富豪重要的财富来源——正摧毁自耕农、佃农和所有家境贫寒的农村人……伯克写道：‘有些人认为，值得质疑的是，将公共和废弃土地圈起来的做法究竟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明智的或可行的。不过没有人认为这些做法已经过分。’他的不满仅止于此。”^①

^① [美] 拉塞尔·柯克：《保守主义思想——从柏克到艾略特》，张大军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20页。

第四，近代以来，贵族被淘汰是历史的必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贵族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也将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随着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中孕育、发展，代表新的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要求自己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要求“主权在民”，最后爆发推翻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这是封建贵族退出历史舞台必然的进程。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以一种最激烈的革命形式推翻贵族统治。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当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无法克服时，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必然，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人民就要当家作主，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实质上是社会结构变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表现在人的身上，就是人民主权范围的扩大，其经济和政治内容的深化。人民主权必然激发出人民巨大的智慧和热情。革命无疑要打破一个旧世界，同时，它也在建立一个新世界。社会不会因为贵族的消失而停滞。近代以来真正的革命无不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正是这一历史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指责中国革命扫荡贵族，遗患无穷。这里可以做一个简要的比较。印度是文明古国，近代以来成为英国殖民地。印度建国没有经历革命，“贵族”没有受到冲击，经济发展的条件要好于同时期的中国。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发展成就远超印度。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德里大学的一个代表团访华。初到中国，访华团中的一位教授很困惑。他感觉到，中国人民有一种朝气蓬勃的气象、奋发有为的精神，印度却没有。在中国住了一段时间后，这位教授得出结论：“我明白那个原故了，这就是经过革命和没有经过革命的分别，印度所缺少的就是一场革命。”^① 经过革命的中国和没有经过革命的印度之间巨大的精神差别，本质就在于谁是国家的主人的差别，就在于人民是否当家作主的差别，就在于人民在国家中的根本地位的差别。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 世界上没有乌托邦，任何国家都有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建设美好的社会需要艰苦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中国在发展中面临许多问题，但把这些问题归咎于革命消灭了贵族是极其荒谬的，把解决这些问题寄托于新贵族（或者精神贵族）也是非常可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只要继续顺应历史潮流，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人民性，继续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就能战胜前进中的一切困难。

参考文献：

- [1] 徐家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生成及其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 [2] 梁柱：《毛泽东防止干部特权化贵族化思想探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 [3] 梁孝：《革命中的启蒙：人民觉醒、人民民主和社会改造——对“救亡压倒启蒙”论的质疑》，《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
- [4] 刘军宁：《保守主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
- [5] [美] 罗伯特·查尔斯·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高岸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编辑：荀寿潇）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144-1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